

建築現代的幻景

——雷畢諾《法國現代》評介

● 唐小兵

Paul Rabinow, *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447pp.

現代、現代性和城市

現代，變幻紛紜，支零破碎，卻又如此沉重，而且無法躲避的現代。

「現代性」，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在他著名的《現代生活的描繪者》（1863）一文中如此概括現代藝術的特色：「指的是那稍縱即逝、難以捕捉、純屬偶發的一切，也就是藝術的這一半，而藝術的另一半則是永恒並且不易的。」

這位陰鬱的巴黎詩人以罕見的熱情盛讚記者兼畫家康斯坦丁·奎（Constantin Guys, 1802-1892）的都市速寫，相信奎的藝術最完整地把握現代都市街頭「閒步者」的漠然，敏銳地再現出來。混迹於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閒步者「既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又處處有如歸的感覺；既觀察着人世，置身於大千世界的中心，又隱身匿迹於芸芸眾生」。這正是現代的空間經

驗，正是現代使人迷醉的自由與失落並存的幻景。正是在這樣一個風景綫上，都市生活不可抵禦地摻合、撩撥着人們瞬息的慾念和想像；現代藝術則用「喧囂繽紛的細節」蜂擁吸引然後又分散人們的注意力。

現代，由此便在不斷急速膨脹的城市裏找到了自己最貼切的象徵。

確實，自波德萊爾令人顫慄的《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之後，現代城市作為一個空間結構便永遠地進入了現代文學。由此而來的廣義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無論是隱晦的象徵派詩歌，還是無中介的新小說，無論是抽象繪畫，還是超現實主義遊戲，都擺脫不掉城市的籠罩，總在孜孜追求再現現代，以肯定或者否定的方式，表達現代生活的種種經驗型態，並由此而思索現代的意義。但這種美學意義上的現代主義顯然不等同於「現代性」，而恰恰是現代性所觸發或者說借以表現的文化現象；同理，「現代性」也不僅僅是指工業化或經濟現代化，而首先是一個涵蓋面廣闊得多的歷史分期概念，泛指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歐洲社會經濟文化經驗，有着深刻的哲學和歷史的內涵。

正因為此，歐洲思想界對現代社會的反思與批判——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就明確發端，至兩次世界大戰後更日益深入，同時在不同層面展開。從政治經濟學到新興的社會學，從文化型態的研究到哲學上的重新思考，從美學觀到歷史意識，從對民主政治過程的描述，到對知識生產方式的再發現，從人類學的宏觀比較，到以語言學為出發點的廣泛解讀，從精神分析到大眾媒體理論，人們發覺最終都無法迴避「現代」這樣一個論述領域。特別是隨着近二十年「後現代」作為一個社會文化範疇的提出，「現代問題」更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並不斷激發新的解釋和論爭。

建築與現代的關係

歐美近年研究現代問題的專著中，不少學者開始深入探討建築和現代的關係。因為建築，特別是現代大規模的城市規劃建設，既是現代工業文明的集中表現，又反映出對現代生活的總體設計。人類學家雷畢諾(Paul Rabinow)的近著《法國現代——社會環境的規範和形式》便是這一研究領域較新的成果，具有相當的特色，值得一讀。

雷畢諾論述法國現代歷史的出發點，正是波德萊爾迷戀而又憎惡的城市空間。確切地說，就是巴黎的建設。以巴黎這座古老城市的現代化為中心，作者試圖探討現代法國社會的一個中間層次，即現代社會的高層文化（或者說科學）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聯繫和相互滲透。雷畢諾在書中既要迴避對時空經驗的純哲學抽象思辨，又不願局限於對現代生活的經驗描述，所以他把焦點集中在那些具體設計和操作現代城市的工程師、建築師、技術人員和管理階層上。他要從現代城市的演變中追溯現代社會賴以

成立的規範和邏輯，也即「理性的各種具體實施」。在這個意義上，雷畢諾要完成的乃是一部「現代性的人類學研究」。

作者所提出的研究對象——「社會環境」——本身便是一個現代的觀念。因為只有進入現代以後，在脫離了以「等同」、「相似」為思維模式的古典時代之後，人才有可能作為認識主體去研究作為客體的人及其環境與歷史。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英譯*The Order of Things*)一書中，雄辯地證明了這個產生新知識的歷史轉折。「社會環境」不僅僅是作為客觀存在的社會關係、政治結構和經濟狀況，同時也包括社會成員所接受的知識框架，主導輿論的論述實踐等。換句話說，社會環境不但是既定的關係綜合體，同時也是由人構造的意義網絡。

「社會環境的規範和形式」概括了現代社會的兩個不同層次。具體地說，雷畢諾所討論的規範是現代社會的理性原則，以及由此原則所界定的現代科學、進步的信仰等現代意識形態。規範是約束性的，制約着意義的產生和流通，形式則可以多樣化、多層面，是規範對現代社會進行組織和調整的過程及方式。規範和形式之所以不能完全吻合正是因為歷史的插入，而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又正好給人們提供了發揮創造性、想像力的空間。雷畢諾恰恰是在這裏找到了重構法國現代的主要綫索。

法國真正步入現代的重要里程碑

在很大程度上，現代歷史也就是以理性原則、科學方法對社會空間進行重新組織的歷史。在追述加列尼(Joseph-Simon Gallieni, 1849-1916)

於十九世紀末在法國殖民地越南北方實施他的綏靖政策時，雷畢諾概括這位軍人的實用社會哲學為：「如果文明的標誌是一條繁忙的公路，那麼現代的標誌則是公共衛生。」公共衛生，或者說對密集城市人口的合理、有效的管理控制，構成了法國真正步入現代的重要里程碑。雷畢諾用1832年春天在巴黎爆發的霍亂揭開了他的歷史描述。這場瘟疫造成18,000城市人口的死亡。它不僅打破霍亂只是東方瘟疫的迷信，而且也對巴黎傳統的公共衛生系統和城市佈局提出全面挑戰。霍亂發生後，市政府各機構，特別是衛生部門對疫情毫無應付能力。但是卻有兩個醫療組織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收集並整理了大量統計數據，特別是疫情與街區分佈、職業特點及貧富人口之間關係的詳盡統計資料。通過這樣一次統計調查，整個巴黎被重新區劃，並且充分地柵格化。這種專門準確的知識無疑為管理人員提供了有力的決策參考。正是在這種知識與權能的結合中，「開始了新的科學論述領域，新的管理措施，新的對社會秩序的認識，從而引發出相當長期的空間—科學—社會技術試驗。」

於是霍亂這樣一場危機，把「城市」這樣一個空間組織系統作為社會問題明確地擺到人們面前。城市現在不僅需要分析、管理，而且必須重新安排、設計，以避免將來可能隨時爆發的病疫。通過各類統計數據，人們發現疾病的發展與人口密度並無直接因果聯繫，但卻和生存條件（conditions d'existence）關係密切。這樣，改善生存條件就不僅是修建住宅，還必須是配套工程。與此同時，有克特樂（Adolphe Quételet, 1796-1874）發展的社會統計學，提出計量意義上「普通人」（l'homme moyen）的概念。

功能效用原則與社會管理

從公共衛生角度對城市空間的重新組織，首先是帶來了建築風格的變化。古典的以自然與人相和諧為總原則的建築模式，逐漸被新起的以功能效用為標準的實用型建築所取代。這一趨勢較早在維奧列—拉—杜克（Emmanuel Viollet-le-Duc, 1814-1879）那裏，集中體現為古典式風格與現代技術的調和。在城市規劃建設領域，則有十九世紀50年代由郝斯曼（Georges Haussmann, 1809-1879）主持籌劃的大規模巴黎擴建。今天的巴黎便是在郝斯曼雄心勃勃的「規則化」計劃中奠定了基型。郝斯曼的城市設想是新古典風格的：秉承巴羅克，卻比巴羅克更龐大的巨型結構，嚴整的規則性和統一排列，強調自成一體的各種高大的紀念碑性建築。當然還有作為美化和清潔工具的城市公園，因為公共衛生和交通已成為新型城建的首要焦點。除加寬主要通衢大街、按人口分佈建設公園以外，郝斯曼的改建方案還考慮到學校、醫院、教堂、劇院和車站的位置。儘管如此，郝斯曼設計的巴黎仍然是前工業型的，還沒有真正成為一個社會性空間。

「社會」在城市設計範圍內成為一個真正的政治技術概念，是在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之後的事。在這之前，巴黎以外的工業區和隨着工業化而興起的小城鎮，新湧現的技術專家就面對急速的工業化帶來的種種社會後果，開始進行各層次的社會改良試驗。譬如，著名的勒·佩雷（Frédéric Le Play, 1806-1882）開創了對工人生活現狀的統計研究，代表了以科學家的態度研究社會管理；而他對莫爾豪斯和勒·克洛索兩個工業鎮進行的社會改良，則代表着由農業社會向工業

社會轉變時期典型的家長政治式的對社會的總體控制。勒·佩雷這種「學者——科學家——改革家」身分的演變，對他個人來說也許是一種水到渠成的自然發展，但他的社會實踐卻為他之後的一大批唯技術控制論者提供了具體的行為模式，即從具體的社會設計考察中實現對社會的改良和管理。這樣一批新起的以技術為基礎的政治家形成了新的權力精英。他們在政府部門據有重要職位（如勒·佩雷曾任公共工業部金屬統計局局長），而且開始具體地貫徹科學的原則和方法。一個代表人物便是李約特（Hubert Lyautey, 1854-1934），他一度任法軍元帥，後來出任法國在摩洛哥保護領地的總督。通過這樣一批新的權力精英，社會控制的實現開始與理性的規範聯繫結合在一起。

規範與形式的全面結合

正是這樣一批新型的以技術為基礎的政治人材，促成了法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社會型態的轉變，即由以道德倫理為社會維繫的文化型態，向以福利制度為社會控制的現代社會的轉變。社會的基本論述內容集中到社會政策的制定和改良，政治形式開始具體到市政參與、工會政治、集團利益。至於地區化政治實體的興起，則打破了傳統的集中型政治模式，社會力量和要求明顯出現多層次化、局部化。在這種社會型態轉換中，像工程師出身的政治家謝松（Emile Cheysson, 1836-1910）、靠紡織業起家而後成為商業部長的西格弗里（Jules Siegfried, 1837-1922）、法學教授杜奎（Léon Duguit, 1859-1928）等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的目標是有效的社會生產和控制，方法是通過比較研究來解決現代工業、現代城市所帶來的各種實際問

題。正是在這個時期，影響深遠的「社會博覽院」（Musée Social）於1894年組成。這個以「社會穩定」為主要宗旨的政策研究機構有兩個具體任務：一是全面搜集比較有關各種社會問題的情報資料，特別是反映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資料；二是幫助人們瞭解保證社會穩定發展的關鍵，並為有關立法而努力。「社會博覽院」匯集了一批由工業家、社會科學家、勞工代表、宗教領袖及殖民者組成的「社會型唯技術論者」。作為一個保守穩健的政策研究機構，該組織很快便被法國政府所認可，並從此開始發揮其持久深入的社會影響。

「社會博覽院」的改良政治方針和對實際問題的唯技術研究態度，終於造成了一個新的以科學理性為基礎的社會論述環境，從中產生出法國十九世紀末年的現代城市規劃思想。一批從負有盛名的美術學院（Ecole des Beaux-Arts）訓練出來的建築家聚集在羅馬，競相提出一個又一個城建方案，開始把現代社會的規範和形式全面地結合在一起，標誌著法國社會環境徹底實現了向現代型態的轉變。並不是說他們所有的設計方案都付諸實踐了，恰恰是他們的理論框架、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空間控制意識，使得他們的模式集中體現了在現代社會中，人對社會進行整體設計操作的慾求。他們的現代精神仍然是樂觀的，相信科學技術可以解決現代社會的一切問題。雷畢諾把這一批才華橫溢的建築家及其在城市設計中表露的烏托邦情緒，稱作「唯技術泛世界主義」（Techno-cosmopolitanism）。

集中體現「唯技術泛世界主義」精神的有加尼爾（Tony Garnier, 1869-1948）設計的「工業城」。在這個理想的工業城市裏，居民的生活需要全部被理性化、條理化，這些都

反映在總體設計裏。新城設計的主要原則是確保生產、再生產的順利進行，生產區、生活區、管理區和保健區的佈局安排有機地組合在一起，有效地使社會生活呈現出非連續化和層次化。有趣的是，在這個工業新城裏，沒有教堂、監獄，也沒有警察所或法庭，因為加尼爾和他的前驅傅立葉一樣，相信人是善的，何況沒有資本主義，也就不會有爾虞我詐了。加尼爾的社會主義式改良設計，集中表現了現代社會對科學技術萬能和不斷進步的神話的信仰。這種啟蒙式人文主義意識形態在鄂布拉（Ernest Hébrard, 1866-1933）對未來城市的設想中更是暴露無遺。未來的城市應該全面吻合現代社會的規範，充分體現科學理性的精神。城市裏應該處處是美觀的花園，林蔭道聯結着所有的住宅區、商業區和工業區；有奧林匹克運動中心、藝術中心，同時城市本身應該成爲一個世界性通訊中心，其象徵則是一個高大無比的「進步塔」，以此來「協調人類的所有奮鬥努力」。正當鄂布拉和他的同伴幾乎就要在布魯塞爾郊外開始營建這樣一個美麗的新世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烟已經昇起。

現代的病徵

這種「唯技術泛世界主義」，一方面是現代社會基本規範表現的極致，另一方面也是現代的病徵之一，它追求的仍然是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式「泛視塔」型社會控制。在這個意義上，法國現代的都市規劃、斯大林式「蘇維埃新人」，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運動，都是啟蒙式人文主義與科學理性的結合，是現代性的徵狀或是現代性所帶來的焦慮的折射，而不是醫治現代社會的藥方。李約特

任摩洛哥法屬領地總督時，便把這種「唯技術泛世界主義」作爲執政方針，即用現代社會的規範來改造前現代型的殖民地。如果現代的基本價值同時也是現代的病徵，「規範」意味着「壓抑」的同時也暗含着「總體控制」，那麼，隨着區社型政治介入的全面興起，以及對人文主義傳統的日益揚棄，隨着第三世界殖民地的紛紛獨立和隨後對本土文化有意識的弘揚，同時，更隨着東歐國家對社會主義模式的擯棄，亦即間接地否定了現代人對社會整體設計的欲望。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看：所謂「後現代」，是對「現代」的科學、進步之類的神話的自覺超越？或者說，是對「現代」這一設計與投射的重新檢查批判？

雷畢諾雖然沒有進而探討「後現代」的問題，但他對一批「具體知識分子」的記述，卻間接地描述了這樣一個轉折，即從啟蒙式普遍型知識分子，過渡到解決具體問題、提供切實措施的中間層知識分子。越來越明確的是，在現代社會裏，正是這些工程師、建築師、統計學家等決定着社會空間的組織分佈，操作了社會的運轉。1908年出現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便明確宣佈不闊談理論，只討論言之有物的「有用議案」（bons dossiers），所有成員只求做「一個無可挑剔的技術專家」。

這種唯技術政治方式，在兩次大戰間最著名的城市改革家色利爾（Henri Sellier, 1883-1943）那裏得到充分施展。色利爾作爲塞納區眾議院的社會黨代表，注意到更抽象的社會空間，它不再是歷史文化意義上的城市，而是整個「匯聚」現象，即現代社會的社會—技術環境。而這個結構的操作控制，只能由具體部門的專家來完成。至此，法國現代達到了一個新階段，即「中間層的現代觀」的出

現和鞏固。所謂中間層現代觀，落實到色利爾的城市規劃上，便是邁向唯技術型空間管理。「普遍推行的社會規範和經濟分層結構，逐漸代替了為維持公共衛生所必需的強制性措施，和出於環境考慮的地區政治形式，從而開始了新的限定並維持現實的方法。對生活的設計也從病菌學和階級衝突階段，向唯功能論和規範性的社會學階段轉移。」

幻景的現代性

這樣，雷畢諾便完成了對法國現代的一個歷史敘述。從1832年的巴黎霍亂到兩次世界大戰間的中間層現代觀，作者想要再現的是這一百多年間人們對現代社會的認識、分析、設計和控制。因為他研究的是一整套社會論述實踐，所以不得不從各個層次、不同的學科全面鋪開（書中直接涉及到生物學、建築學、地理學、統計學、社會學、衛生學等），同時不得以跳躍方式橫跨眾多場景。從巴黎到莫爾豪斯，從越南到摩洛哥，雷畢諾基本上以人物和某一社會思想為主要敘述綫索，條分縷析，層層追蹤。書中人物、學派豐富龐雜，數據事實錯綜繁多，充分顯示出作者在研究上細緻深入的功夫。

更具特色的是，此書的敘述方式常常是跳躍性的，章與章甚至節與節之間，不一定有任何直接聯繫或因果遞進，而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如那場觸發全書的霍亂、1848年歐洲革命、70年代的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以及一次世界大戰，在全書中都只是作為背景出現，對其完全沒有正面的描述或解釋。這種對「事件」的弱化處理，當然和當代法國史學界流行的年鑒學派的影響不無關係。也正是依靠了「長段時間」（la longue durée）的歷史觀察法，雷畢諾才有可能追尋到

「現代」社會型態的浮現過程。

雷畢諾直言不諱，說這本著作是獻給福柯的，其基本思想、組織方法，都和福柯所開創的社會思想史研究傳統一脈相承。福柯無疑是當代研究現代問題最有成就的大師之一。他有關論述行為的理論和對現代知識—權力關係的分析批判，為雷畢諾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解讀所有歷史文本的方法。無論是統計資料、建築方案，還是城市佈局、政策報告，都可以而且必須作為記錄社會知識結構、體現對時空的想像的文本來解讀。對這些文本的表意過程的再構，便形成了一種新的歷史敘述。這種歷史再構所展現的往往是那些控制操作着我們的行為和想像的種種規範；這些規範的現代表現形式又是那麼變幻無窮，令人眼花繚亂，以至於使我們相信了現代的幻景。

雷畢諾的《法國現代》一書所揭示的，恰恰可以說是「幻景的現代性」。

唐小兵 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後獲美國杜克（Duke）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擔任詹明遜（F. Jameson）在北大講課記錄，譯有《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現任教於杜克大學。